

# 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朱靖华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07)

**摘要:**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从总体上看,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以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趋向。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如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特别是人民大众兴起的新思想、新内涵如“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取向和个性解放思想以及庶族士子诗词文中的关心民瘼、抨击时弊和爱国思想的酿成。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不抑兼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庶族士子阶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975(2003)04-0005-06

近年来,有的学者过分强调宋代文化之繁荣,而提出了社会、文化发展一致论的观点。如云:“(宋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新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一个新时代。”<sup>①</sup>有云:“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②</sup>这些观点,颇有可商榷之处。

个人认为,宋代的社会及其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宋代文化确实有着高度的繁荣,但宋代社会是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是否达到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的物质、精神文化“空前绝后”的“高度”?我认为不能这样概括。这是因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历史和该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以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说明这个历史时代”<sup>③</sup>。

宋代的统一,曾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中央集权也取得了北宋前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这对发展生产和繁荣文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它并没有超越“社会的一般发展”范畴,故不能从抽象意义上理解它的“进步”。譬如,赵匡胤的建宋代周,是以其禁军头目的权势,依靠陈桥驿“黄袍加身”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也就是说,宋代统治者是在未曾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

的痼疾条件下实行了中央集权。从有宋一代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来看,它虽是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它基本上是延续和部分地发展了唐代以来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譬如农民租佃制的普遍施行,它部分地松动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促使自耕农、手工业者及商人得以顺利发展。但是这种积极变化是传承了盛唐既有的政策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两宋自身的创造。宋代并没有更多、更新促进社会上升繁荣的高明招数,相反,由于其封建专制机制的本身的老化、运转的失序和指挥的不灵,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种种矛盾和弊端,逐步滑向了不可逆转的走下坡路的泥沼之中。

我认为,造成两宋社会衰落的标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行加重掠夺的“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政策

早在建国初年,北宋即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是赵匡胤承继唐代“两税法”使土地私有制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的用意是十分明显而露骨的:“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即依靠大地主兼并者加大其盘剥和压榨,根本上并不顾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据史料记载,宋朝的开垦土地比唐朝

小,只有唐明皇时代的三分之一。在可耕面积缩小的境况下,土地兼并者却变本加厉,至太宗、真宗朝,便有长安“兼并之家”十余族的官僚“侵渔细民,凌暴孤寡”,“广置良田,岁利甚溥”。全社会逐渐形成官僚、地主、豪商三位一体的统治态势。北宋时期,大地主官僚已占据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延至南宋,官僚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愈剧烈,已是“官户田居其半”,而潭州地区,已出现了“五等下户,才有寸土”的惨状。加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而使“不立田制”的政策愈加泛滥,造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灵,无钱则卖”的现状。大地主兼并土地的迅速集中,致使破产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加以赋税的沉重,造成农民的大批逃亡,而各地衙门皆设有军队,到处派兵拦截和搜捕,酿成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形势。另者,宋代耕地面积的缩小,实与大地主兼并者隐瞒土地、逃漏课税有关,他们把向朝廷“输纳”的沉重捐税,全部压到农民及小手工业者和商人身上,导致了各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频频发动武装起义,震撼了宋王朝极权统治的基础。

#### (二)、租佃封建生产关系逐步走向反面

宋代普遍秉承了唐以来出现的进步的租佃制,使之成为宋代地主对农民剥削的主要形态。表面看去,似乎地主与佃农之间仅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似乎地主对农民只是索取其土地获物的一半或六成,并不希图从自己占有土地上获取最大的利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地主们不仅利用从属、履行一定的义务,安然地消费着农民的劳动成果,更千方百计地用肮脏欺骗的手腕增多其赋租剥削。在“二税”征收中,在田税之上,附加了一种“加耗”税。宋王朝规定:农民每交一石,需别输二升“鼠雀税”。贪官污吏还趁机公开或暗中加耗,且名目繁多,形成“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使附加税超过了正税的两倍。甚至朝廷还把某些逃户的税额,强加给未逃亡的农民身上,使赋税愈加沉重难堪。此外,还设有“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税、城郭赋、屋宅税及大量商税等等,其总数要比唐代重七倍。故南宋朱熹曾总结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繁重的地租赋税和养家糊口,令农民同他所租佃的小块土地一起好像连根生长着似的。故实际上,租佃土地的农民,并不真正是取得了自由雇佣工的地位,仍是像农奴般的是地主的财产性质。两宋地主对其占有土地的关系,实现着死的物质对人们的严酷统治。因此,宋代土地占有者对佃农的态度,直接是政治性的,在这种直接政治性租佃关系下,农民百姓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人们“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苏轼在其诗文描写中就有“踏地出赋租”、“卖牛纳税拆屋炊”及“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之叹;而李觏的《农老妇》,则描绘了一椿为纳税而出嫁其六十多岁老祖母的惨事……于是,租佃制的“进步性”也就越来越小,而其反动性却越来越大。

#### (三)、“养兵”政策造成国势颓败形势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后,提出了一个“治天下”的最好办法即“养兵”,他认为遇到荒年有“叛民”不会有“叛兵”(兵有供养),制订出荒年饥岁招募饥民为兵的政策,如此则既可削弱农民暴动的数量,又可成为镇压暴动的工具,一举两得。于是,自北宋初年至仁宗朝的短短六十年间,“养兵”已增加了近四倍。其中仅是直辖“禁军”即有八十二万,另有地方军队二百多万(地方团练还不包括在内)。宋朝人口约有四千多万,竟养着二百多万军队,军民比例已达二十比一,是十分惊人的。其结果是“六分财,兵占其五”,突出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军队常被派做苦工,时而领不到军饷,便酿成了频频发生的兵变事件。“宋有天下,艺祖(指赵匡胤)、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暨一再传,则兵愈多而国愈弱。”

两宋可说是中国封建国家中国势十分虚弱的王朝,其突出特征是:领土要比唐朝小,而整宋却与辽、金、西夏、大理乃至回鹘、吐蕃等数个异族政权长期并存对峙。加以过分集中军权,实行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政策,使上下脱节,临阵打仗,皆须依从中央“图阵”进行,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屡战屡败。“养兵”和集权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这也显示出宋代封建社会的加速衰落的情状。

#### (四)、大开科举,形成“冗官”腐败统治

宋代统治者为加强其官僚机构的统治,大开科举,以网罗天下的“政治之具”。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唐代。在宋代,几乎凡读书人皆可成为进士,考十次未录取就送个进士,六十岁未考取也送个进士,名曰“敬老”。当时全国共有二百个州,州刺史竟有数千个(每州平均有十余个刺史);十二个镇,即有八十多个节度使。到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政府官员已达两万多人。据史料记载,宋官员俸禄十分优厚,如宰相、枢密使,其正俸中之月钱即有三百千之多,这在当时可购置一百多亩良田。每个官员共有四种俸禄,除油盐酱醋茶,每日尚发酒、办公费。一个宰相可有四十顷地供其收租,县令也有七顷地收租,名曰“职田”。此外还发仆人钱,最大官僚可有七十个仆人,最小者也有两个仆人生活费。正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两宋官僚机构的臃肿和膨胀,形成历史上有名的“冗官”政治。更有甚者,由于官多、人际关系复杂,在其内部又激发出种种矛盾,形成宋代比唐代愈加严重的党争之祸。自真宗朝起,陆续有庆历党争、新旧党争,以及各种宗派之争,而且相互牵制、党同伐异,斗争残酷、愈演愈烈,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大大瓦解了王朝统治的稳定。王夫之曾总结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亡而不息。”

#### (五)、宋代制定严酷法律,并施行愚民政策

据史料记载,宋代的法律约有三万余条,人民百姓动辄犯法,使大批造反起义者遭到囚禁和屠杀。对于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则实行文字狱,朝廷专设御史台机构,以随时弹劾、告讦忠良,著名的“乌台诗案”之囚禁

大文豪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事件。

宋代还施行惠民政策和奴化教育,以禁锢群众思想的自由发展。突出的是加强了佛道合流的宗教统治。宋王朝统治者到处封神建庙,愚弄群众。如东岳庙原属道教,将掌生死的东岳大帝和大司命神与印度佛教的地藏菩萨(阎罗)一个住前殿、一个住后殿,使人们分辨不清是禅寺庙或是道士观。关羽封神始于宋代,与“孔帝”一文一武,让人们顶礼膜拜。“八仙”封神也起自宋朝,在宋朝,还特别讲求愚忠愚孝,从思想意识上控制群众,更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当做正统官学;又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准则,到处建竖贞节牌坊,以加重对妇女的迫害,形成为宋王朝对人民愈加残酷压迫的重要标志。

(六)、宋代频繁浩大的农民起义,昭示了封建社会没落的“新阶段”

宋代农民起义不仅发生早,而且规模大,次数频繁,组织严密,口号先进。早在北宋之初的太祖、太宗年间,即已出现了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宋仁宗朝应是北宋最鼎盛时期,但其农民起义在五年之内即攻破了五十座州城,而且斗争愈加扩大和激烈。在两宋期间,有人统计,大小农民起义约计两千余起,最多者“殆众百万”,最少者也有千人以上,数百人一伙者尚不在其内。

最醒人耳目者,是宋代农民大起义,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崭新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纲领口号,具有划时代的思想意义,它突出地反映着宋代封建专制社会已经趋向于腐朽没落的历史“新时期”。如在宋太宗淳化时期出现的四川王小波、李顺大起义,提出了鲜明的“均贫富”口号。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发难在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么大起义,也提出了“等贵贱”的尖锐口号,这种近乎近代意识的“平等”观念,正是摧毁封建后期社会的锐利武器。它也反映着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特点。还有宋徽宗宣和年间在两浙发生的方腊大起义,据说也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响亮口号,封建统治者恐惧其号召的威力,曾故意用错点句读的卑劣手法歪曲它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正从反面看出宋统治者对于这种新兴平等观念的恐慌心理。再者,方腊起义不仅有先进的民主思想口号,还发表了一篇前所未有的告民众宣言书。其大意是:人民终岁劳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而不可得,苦于剥削久矣!又朝廷肆意浪费,以岁年百万的财富供给西北二虏(指辽与西夏)。外敌越加欺凌百姓,鞭笞杀戮,毫不怜惜。乃号召轻徭薄赋,以宽民力,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这是我国农民武装斗争史上最早的一篇战斗宣言,意义十分重大。宋代的农民起义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也达到了历代农民起义所未达到的新水平、新态势。如王小波、李顺起义为反抗耕地不能自给及高利贷的盘剥,在“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的口号下,实行了均产运动,把乡内大姓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根据贫农人口的多寡分配其财物,“一切调发,大赈贫乏”;还给贫农安家,凡鳏寡孤独者皆予以较多财

富使之养老。他们还“录用材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故凡贫苦农民皆起而依从,十天内即有数万人跟随,所到州县都开门迎接。方腊起义是借助宗教(即根据张角太平道教教旨发展成崇拜光明、厌恶黑暗的摩尼教)形式助其入会者安家,便迅速召集和组织起了十数万贫困农民群众。湖北湖南的钟相、杨么起义,也是借助宗教形式进行活动,将其教旨称作“新法”(指“平等贵贱,均平贫富”),反对宋王朝的一切封建制度,统称之为“邪法”。使几百里的人民群众背着粮食来跟从,“有众四十万”。起义时烧官府、焚寺庙,杀官吏僧道及算卦人。他们还组织了公社、废除了货币,每人发一编号腰牌,无论走到何处皆可吃饭。因此,宋代的农民起义无论在规模和组织方面都具有近代意义的高水平,远远超过汉唐时代的“赤眉”、“黄巾”等低阶段的农民起义。两宋具有近代意识高水平的农民起义,已孕育着社会革命的民主主义胚胎,正突出现出宋代封建社会已趋向走下坡路的时代特征。

纵观上述,两宋社会的历史地位已经十分明确。个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诞生起,至汉代是上升时期,魏晋南北朝属曲折上升时期,至盛唐则达到鼎盛;但自中唐“安史之乱”后,社会开始发生转折,到宋代,已逐渐趋向走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了。明清两代虽有某些回升和波澜的情势发生,但在总体上,封建社会大厦的倾倒和衰亡,已是注定的无可挽回的现实命运了。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都属企图挽回封建颓势的改革运动,终于走向失败,证明他们已是无“天”可“补”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以史实证明了宋代封建社会已趋向于衰落后期,并不低估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承上启下,具有波浪式前进的印迹,造就过一些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但它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走下坡路的性质。因而它并不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那么,宋代这种衰落的社会情态,与繁荣起来的文化形势,又是如何联系和出现了不平衡的呢?个人认为,其主要标志,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庶族地主的兴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两宋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宋最高统治者鉴于内忧外患而大开科举,网罗天下“致治之具”,致使庶族地主及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蜂拥登上政治历史舞台,逐步形成以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政治格局。庶族地主阶层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具有着维护封建地主统治的特性的,但由于它也长期遭受贵族大地主的欺压和兼并,又具有着反封建禁锢、要求自由解放的一面。个人认为,两宋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庶族地主反压抑、反迫害文化要求的一面。庶族地主阶层及其士子们一旦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重压下腾跃而出,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迸发出各种文化艺术创造的才华。这些才华和能量的总和,便促成了两宋文化的高度繁荣。从另一个视角看,可以说,正是宋代后期封建社会



的衰落时代的现实生活,哺育出两宋文学繁荣的诞生。两宋这种文化的高度繁荣,可能对宋代统治阶级的歌舞升平做了绚丽的点缀,因而受到宋统治者的青睐;而其正视现实、针砭现实,同情民瘼,个性解放以及将文化庶族化、平民化的内涵,却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出某些自我融解的因素,迫使宋代大地主统治者出面极力阻遏和禁止。这就是为什么本在求得封建制度“长治久安”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开始时它会受到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后来便复遭大地主顽固派及贵族利益总代表的宣仁太皇等极力反对和压制的根本原因。

庶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和要求,反映到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建设方面,便出现了哲学上的“疑经惑经”思潮、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和在诗、词、文、赋、绘画、书法艺术上的开拓创新的新时代特性。

哲学上的“疑经惑经”思潮,冲决了自汉以来束缚士子思想的“注不破经,疏不破注”、讲究训诂和师承的凝固“经学”桎梏,发挥了“六经注我”的自由思想的新态势,出现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新见解、新体系。如欧阳修的疑“十翼”、王安石的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反变法派的责《周礼》,还有吴棫、朱熹的疑伪《古文尚书》,乃至晁说之的对所有经典都提出质疑等是。据《邵氏闻见录》卷11所记,当时“或非、或疑、或辩、或黜”《孟子》书者,大有人在。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反传统思潮和讲求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形成了与“汉学”有别的“宋学”。宋代经学的再度兴盛,反映了庶族地主统治精神的新需要,它是儒学在新历史条件下融汇佛老思想所形成的新儒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应予一定的历史肯定,但它终究属于封建思想体系,并不能不受到宋代专制统治的思想制约。于是,它从疑经开始,至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又逐步走向了反面。理学是处在危及整个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它的中心思想仍是以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秩序为目的,故它最终归结为“明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教条。这就是为什么理学开始曾遭禁被称“伪学”,而至南宋终成统治支柱思想的社会原因。也充分反映出庶族地主阶层思想文化的“双重性格”。

从文学的繁荣方面观察,宋词是两宋文学繁荣的突出代表,历来有“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的称誉。标志宋词繁荣的作家和数量是相当多的,而其大多数则是出身于庶族地主阶层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群。据唐圭璋辑录《全宋词》及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二书合计,共有作家一千四百余家,词章两万余首,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晚唐五代。先从传统的婉约词的发展和兴盛来看,前有晏殊、欧阳修开道,继有柳永、张先发展慢词,中经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婉约高手的咏唱,使婉约词展现出柔媚婉丽、意境深曲的高韵风貌;后又经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词家的抒发隐沦、寄托幽邃,更使词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另有突出代表宋词繁荣成就的苏轼,他则顺应时代

诗文革新要求的潮流,以其“独阴”则“乾坤毁”(《东坡易传》卷7)的哲学观念,在艳科文人词独霸词坛的局面中,树立了“阳刚”之气,取得与“阴柔”的平衡,从而创制了“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豪放词,从而打破了传统专抒男欢女爱、忧怨私情的文人艳科词的局限,扩大了生活题材面,熔铸了家国精神的时代最强音;他还“以诗为词”,创造性地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解放了词体,创作出咏志言情、怀古感旧、田园风光、谈禅说理、送别酬赠、娱宾遣兴等等绚烂多彩、风格多样的词章,成为一种崭新的独立抒情的新词体。延至南宋,当中原沦落、宋室偏安,普天下高呼强兵御敌、光复旧物的爱国义愤声浪中,发展成为以爱国将领辛弃疾为代表的悲壮慷慨的豪放词派。诸如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抗金志士词家的凌云浩气,大大地鼓舞了人民大众的发愤报国情怀。这些词家群体立即在词坛形成了“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的繁荣局面,成为中国词史上光辉耀眼的一页。

在诗文创作方面,宋代士子也有新的开拓。如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所形成的与唐诗抗衡比肩的宋诗体制,使两宋诗家群星灿烂、光耀夺目。散文则有以欧阳修、苏轼主盟文坛的新古文运动,也形成了“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和“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的繁荣局面。其他在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新开拓,如出现了书法史上著名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绘画史上则有苏轼、文同(与可)画派,是中国写意画的中坚;宋代的山水花鸟画,崇尚自然,追求神似写心,向诗化靠拢,而成为独步一时的艺术瑰宝。

宋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受到两宋封建社会后期特征的影响和制约。与宋代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历史特质相适应,两宋文学艺术的内涵,突出表现出“尚理”、“瘦硬”、“精警”、“峭拔”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不论是宋人的“以议论为诗”,或是米芾、苏轼的枯木怪石,都透露着一种沉潜、枯淡、主“气”、蹈虚的意境,却缺少了盛唐的丰腴和浑韵。可以这样说,在两宋庶族士子的文学艺术里,已基本消失了盛唐童稚的梦幻和青年的热烈,只有屡遭挫折的中年人的冷静思辨和对人生哲理的深邃探析。所谓“少喜唐音,老趋宋调”,正深刻地反映出两宋社会趋向腐朽所发出的强烈反思情态。

(二)、人民大众民间文化的火爆兴起,与宋代封建统治文化形成鲜明对立

经典作家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剥削阶级文化和被剥削群众的文化,而后者,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当然,这只是从文化特质上加以概括。具体分析之,还有它的复杂性,如庶族地主文化的两重性,它既有属于维护大地主统治利益的文化方面,也有反禁锢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方面,甚至还有中间偏右或偏左的文化复杂情

势,更有少量接受人民大众文化影响而溶入其洪流的同盟军文化,这后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譬如北宋出身“布衣”、一生关心民瘼,并从意识上把自己编为“民之一”的苏轼,他在挫折和谪贬中实行的种种惠民行动和创举,曾成为元、明、清正直知识分子的楷模,受到宋以来历代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南宋时还有两位终生与理学相斗争的陈亮和叶适,他们主张日用实事实物谓之“道”,强调忧世,反对空谈心性,反对把“天理”与“人欲”、“理”与“物”截然对立,这些观念,显然是受到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影响而来者。这也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其内部滋生出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反映。

因此,“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思想,是宋代人民大众文化的真正灵魂,也是促成两宋文化繁荣的重要支柱,它曾调动了人民群众以高昂姿态创造自我文化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标志两宋文化繁荣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的广泛运用,虽有庶族官僚士子所参与,但其基础多是来源于广大手工业者和民间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如活字印刷术,即由“布衣”毕昇所发明;天文学的“浑仪”和机械“天文钟”,虽由庶族官员苏颂和韩公廉制成,但后者显然是汲取了劳动人民使用的手车、桔槔、凸轮、杠杆等原理而创制成功者。至于医学及“针灸铜人图”,更系“草泽”民医所创制。针灸技术经“针灸铜人”得到推广后,并经民间医生不断创新,常获特异之效,甚至连宋仁宗皇帝得疾,也召“草泽”医生治病,使用《钱经》尚未使用过的新穴位(惺惺穴),获得良好效果。庶族官僚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他还在我国祖先发明的天然磁石指南仪和北宋人造磁铁片指南针的基础上加以多方实验和改进,创制出悬系指南针,后又经人们据之制造出罗盘针,才成功地广泛运用到航海事业上去。可见,指南针的发明创造,是历代人民的能工巧匠与庶族士子集体创制而成者。火药武器的发明和发展,也大体如此,它最早起自道家的炼丹炉,后逐渐应用于军事。北宋时出现了专制火药武器的手工作坊,广大手工业者不断积累制造火毯、火箭的经验和智慧,与下层低级军官合作,创制了具有相当威力的火炮、蒺藜炮、霹雳炮等。据仁宗时由曾公亮、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武经总要》记载,尚有火鸡、铁嘴火鹞、毒药烟毯、霹雳火毯等十数种火药武器,用于抗金战争。不过,两宋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受到封建后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如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以贩运形式为主的商业性质,其活动范围较为狭小,因而未能达到资本主义萌芽和扩大再生产的先进程度,致其使用价值也达不到充分的发展。

宋代人民大众文化繁荣最值得注目的一件大事,即是“说话”(小说)艺术和民间戏曲的勃兴,它们在本质上应属独立于统治阶级文化之外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形体。宋代由于社会经济长期缓慢的积聚和发展,统治机制的老化和运转指挥的不灵,以及地主官僚享乐腐

化生活的日益膨胀,时有“统而不治”的现象,给租佃制带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自由以乘机发展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和土地失所有者大量涌入城镇。其结果,形成了两宋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京都开封当时已是国内外的贸易中心了,参加行会的店铺共有六千四百多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开封汴河岸的店铺林立、交通繁忙、人头攒动的热闹情景。其他如洛阳、扬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也大都类似。加以文化教育因科举和印刷术发展得以迅速普及,为“说话”艺术、话本小说及戏曲音乐(包括杂剧、傀儡戏、皮影、诸宫调等)的创作发展奠定了丰厚基础,各种民间伎艺都向城市集中汇合,使城镇自然成为公众娱乐的最佳场所。于是,遍城出现了群众游艺的“瓦舍”(瓦子)、勾栏、看棚,其最大者可容数千人,而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谓热闹非常。从民主主义的平等文化意识来观察,它们具备了如下几个鲜明特点:其一,作者已由达官贵族文人学士转化为下层民间艺人。据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宋代“小说”者,则有粥张二、张黑剔、酒李一郎、故衣毛三、仓张三、枣儿徐荣、熈肝朱、撮條张茂等人,显然属于小商贩和城市贫民一类下层市民;至于“讲史”者,则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林宣教、穆书生、陈进士等,明显是科场失意沦落底层的读书人。其“说经解经”者,则有长啸和尚、达理(和尚)、有缘(和尚)、余信庵、啸庵、息庵(尼姑)及陆妙慧、陆妙静(女流)等,应是冲出寺院当众设帐谋生的僧尼群众。宋杂剧也多是优人自编而成,如《东京华录·京伎传艺》云:“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其余不可胜数。”其二,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已脱离开帝王将相和地主老财,以及文人学士范畴,换成劳动人民和下层妇女及市井人物,如农民、工匠、店员、小贩、婢女、艺伎等,都从过去的小丑配角变为受歌颂的正面形象。从现存可考的宋人优秀话本小说《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快嘴李翠莲记》等作品看,其中《碾玉观音》的女主角蓬秀秀是裱糊匠的女儿和王府的女奴,男主角崔宁是贫穷的玉匠艺人。《错斩崔宁》的女主人公陈二姐是小商人之妾,男主人公崔宁是卖丝小贩。《快嘴李翠莲记》的女主角李翠莲则是民间的巧嘴媳妇。都属下层人民群众。其宋杂剧的主角人物也常是“田舍儿”、“村夫”、“村妇”等形象,如《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云:“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论,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殴态,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其三,话本、戏曲的思想内容,多是揭露和鞭挞封建统治阶级的欺压和盘剥、支持被压迫妇女的反封建禁锢、赞扬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行动等,它突出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展现了城市下层民众的优良品格及其现实悲惨生活图景。如《碾玉观音》揭示了咸安郡王统治者将私奔逃走的女奴秀秀抓回活活打死的凶残野蛮行径,并表现了秀秀对爱情的生死不渝的坚强不屈精



神。如《错斩崔宁》的直斥封建官吏率意断狱、草菅人命的昏聩残酷,以及宋代封建司法制度的罪恶黑暗,具有血海深仇性质,其情节矛盾的愤怒和震撼,足以焚烧封建官僚腐败统治的一切法规。《快嘴李翠莲记》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绝顶聪明、豪爽,敢于正面向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挑战的妇女形象,她为了坚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宁肯与封建家庭决裂出家为尼,也决不委曲求全。她的与封建礼法格格不入的自由不羁性格,具有超越她所处时代的先进色彩。宋杂剧虽“务在滑稽”,但“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显然也在揭示朝廷的腐败和官场的污浊。而始于宋光宗朝的南戏,有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狂魁》、《狂焕》、《张协状元》、《鬲玉传奇》等,则大部分以歌颂爱情婚姻自由、反封建礼教束缚为主题,《张协状元》还表现了人民与官僚权势相斗争的胜利,赞美了贫女的质朴善良、忠贞爱情的品格,令人向往。总之,以上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有意识地与封建统治文化相抗衡,并与之争夺历史舞台,树立自己阶层的正面形象和社会主角,说明两宋频繁农民起义者所传播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观念,已经深刻地渗入到人民大众艺术文化的思想意识之中了。

当然,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都是统治思想。还当两宋封建社会尚未僵死、仍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后期时代里,人民大众文化的胚胎尚处于幼弱生长的形势里,统治阶级文化自然会通过其文人士子侵蚀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特别有一部分带有封建意识的庶族中下层士子投入了“书会”和“才人”的创作队伍,他

们便直接在其说话、戏曲艺术中大量散播着一些三纲五常、因果报应、宿命迷信、猥亵淫秽等的封建统治文化的观念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较优秀的话本戏曲中,甚至还杂有某些鄙俗软弱的意识观念,也时有所见。这反映出不成熟的民主平等思想,在宋代强制性封建社会制度环境下所行走的曲折前进的印迹。

最后,我们虽然强调了“两种文化”论,但对于封建大地主统治者的文化,也并不一笔抹煞。当宋初的中央集权,及它传承唐代租佃制、商业流通经济,和广开科举吸纳士子贤才进入政权机构等措施中,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两宋文化繁荣的促进。作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链条,两宋时代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宋代有少量君主喜书好文,如太祖好读、“性好艺文”,太宗“性善读书”,真宗“专以讲学属词为乐”,徽宗“喜为篇章”,这会有“上行下效”、对两宋文化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决不能由此说,宋代帝王的爱好文雅是推动两宋文化繁荣的主要动力。

#### 参 考 文 献:

- 〔1〕缪钺.宋代文化浅议〔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丛刊,(第5-3辑),1991.
- 〔2〕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2,(2).
-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0.

## The disequilibriu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ZHU Jing - hua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cultural boom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was, so to say,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social materials constituting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t that time the Dynasty was in the later period and on the decline. On the whole, the rise of the Song Dynasty, unlike that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hich came as a result of a massive peasant uprising that pounded at the feudal production relations, came as a result of the Chenqiao Munity and the "banqueted dissolution of military power" strategy. The Song Dynasty didn't actually do any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chronic malady of the feudal system itself. It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relations were basically a continuation and partial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ageing of its own feudal autocratic organizations and its ineffective commanding, intensified its social decline. The cultural boom in the Song Dynasty did not come as a necessary derivative from the feudal autocratic system but chiefly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in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later period of feudalism(e. g. the landlord stratum of the clan of commoners wa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and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a result of the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was in particular a result of the new thoughts and new connotations that rose among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such as "equality in wealth and slatus", an equality and liberty orient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ty emancipation. emancipation. Scholars' concern over the hardships of people, their lashing out against those days' evil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patriotism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oming of the boom.

**Key words:** disequilibriu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ulture; growing poverty and weakness; idle officers and soldiers; stratum of commoners and scholars